

唐庚诗文初探

陈伯勋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县人。生于宋神宗三年(1070),卒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1)。唐庚年少聪颖,十四岁就能诗会文,出语惊人。十八岁时,抱着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不顾兄弟妻儿泣涕挽留,击鼓发棹,奋然出游;至京师,遂与群俊奋先。后来在眉州人任德翁的循循善诱和热情帮助下,更发奋攻书,立志作出一番事业,终于在绍圣元年(1094)中进士。从绍圣三年到大观四年春(1096—1110),他先后在益昌、阆中、绵州、凤翔等州县任地方上的小官。大观四年春,始入京为宗子博士;同年,蜀州新津人张商英再拜右相,见唐庚有奇才,荐于朝廷,被提升为京城地区管财税的提举京畿常平。后因张商英罢相,唐庚受株连,从政和元年(1111)贬谪到惠州。在惠州罗浮山谪居七年后,于政和七年(1117)被赦还,复官承议郎。宣和二年(1120)告假归蜀,病卒于凤翔道中,终年五十一岁。

唐庚曾说,他以诗文得名,也因诗文得谤获罪,故平生所作诗文,随作随散,未能很好收存。现存的《唐眉山文集》(亦称《眉山唐先生文集》),仅是他平生所作诗文的一部分。《唐眉山文集》共二十四卷,其中诗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卷首另有南宋强幼安辑录的《唐眉山诗话》一卷凡四十五条。

唐庚诗文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当时就有一定的影响。南宋以后,有多种版本流传,受到了不少名家的重视。《书录解题》、《李雁湖集》、《后村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鹤林玉露》、《林竹溪集》、《诗话类编》等对唐庚诗文均有评价。在为《唐眉山文集》作序的诸人中,郑太玉认为唐庚“见道之明可匹韩柳”,其“属意遣词,必存药石之道”,“体高而妙”,“词严以精”,“文章博雅超诣”。吕棻认为,唐庚“官不称其材,其诗可比之于《离骚》、《归去来辞》、卢仝的《茶歌》”,可“不待官而后显”。汪亮采则指出,唐庚诗文,其“风骨与理气,如乔松之凌青汉,天风夜警,万籁皆作,以其声之宏而信其实之大焉耳”,其“词锋学力,乃其时令为之,斯为能读子西之文,并可以读南渡前后诸家之文。”可见唐庚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对他的诗文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唐庚诗文,是他所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他生活的社会现实的艺术反映。唐庚生活的半个世纪,是在北宋的中后期。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革新集团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集团斗争的时期。唐庚进入仕途后,也正是北宋后期变法派短暂再起失败后,

由蔡京、童贯腐朽集团掌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激化、内忧外患严重而逐渐走向衰亡的时期。唐庚诗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劳动人民多方面的苦难，表现了作者对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真挚深切的同情，富有较强的人民性。唐庚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在地方上作小官，后来多年贬谪惠州，有机会接触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了解人民的痛苦，体恤民情。他在儒家“以民为本”，“兼善天下”进步思想的指导下，继承了唐代杜甫和宋初欧阳修诗文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来何处识面目，应在少陵诗句中”。（《登越王楼》）；“我思六一翁，……诗尝思讽谏。”（《六一堂》）主张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与国家、人民有关的重大事件，做到“笔下无时俗，胸中有岁寒。”所以，他的诗文，对人民的疾苦表示了一个封建下级官吏的最大同情。他的《喜雨呈赵世泽》一诗，就集中表现了唐庚的这种思想感情。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地方官，既忧天旱，又忧水涝：“去年雨多忧水潦，今年雨少忧枯槁”。既为要完成封建国家需要的大量赋税而忧愁：“赋输百万未破白，簿脚何缘得勾倒”。他面对自然灾害和人民的苦难严厉自责，认为自己为官失职，“都缘县政失中和，水旱年年勤文老。”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封建地方官，愧对终年勤苦仍不免啼饥号寒的劳动人民，觉得无颜禄位：“上书自劾欲归去，老妇挽衣傍夺藁。”当天降雨水时，便觉“稻畦稷穉势已活，竹里萧疏声更好。”为农民将有一个好的收成而满心喜悦。

每年征收红藤，是宋朝很早沿袭下来的旧制，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对此，唐庚也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岁调红藤百万计，此贡一作无穷时……今年输藤指黄犍，明年输藤波及屋。”最后他愤慨地大声责问：“吾皇养民如养儿，凿空为此谋者谁？”（《采藤曲效王建体》）在《武兴谣》中，作者更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去年山中无黍稷，只有都根并橡实”的困苦生活和“今年藪尽橡实贵，山中人作寒蝉枯”的悲惨绝境，对北宋统治者的沉重赋税和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贫穷苦难的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刻地揭露和深切地同情。《富乐山》一诗，唐庚用辛辣嘲讽的笔调，通过对富乐山历史上刘璋犒劳拥兵入蜀的刘备而造成当时“兵起四十秋，拆屋不足供诛求，生灵嗷嗷鼎中油”灾难的典型描写，对比性地深刻揭露了北宋时“想今富乐万倍刘，端能容我逃穷愁”的严酷现实。唐庚在任提举京畿常平期间，他在《诚谕诸路提举常平司岬民》中，更是针对当时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沉重赋税和横征暴敛行为，明确地提出了“理财所以养民，养民所以阜财”的辩证统一关系，反对“只知理财而不知卹民”，“财用不足而加赋扰民”的做法。他主张“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给，予欲使民凶年饥岁无流离失业，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达。”要求官吏“奉法唯谨，无意外凿空以浸渔小民”，坚决严禁官吏“或索课折强以利岁入之赢数，期会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系垒敲扑以邀治辩之功”，如若查出，“必罚无赦”。这里最表现出唐庚儒家“以民为本”，“达则兼善天下”的进步思想。唐庚这种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民主性思想和感情，在《讯囚》一诗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突出。他对那些“等是为贫计”而被迫起来挺而走险，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囚犯寄予了深切同情，而且还深刻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自古官中贼，一一民膏血”，“无功食国禄，去窃能几何”的丑恶现象，最后使良心未泯的官吏自觉形秽而决心弃官而去，以表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的严正抗议。唐庚这首诗思想内容之进步可贵，正表现在诗人不只是停留在对成为囚犯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上，而是进一步地对自己所属阶级本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比那种“吏禄三百石，岁

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来，不能不说是思想认识和行动上都大大地向前迈出了一步。

唐庚诗文思想内容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北宋这个高度专制的封建王朝，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极端奢侈腐朽的生活作风和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本质。由于长期对辽、金、夏军事斗争的耗费和每年岁贡需要大量钱财，以及对国内农民反抗的镇压，所以，对农民的剥削是异常残酷和沉重的，正如一首宋诗所说：“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张咏《悯农》）唐庚生活的北宋中后期，更是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腐朽糜烂和日趋衰亡的时期。唐庚由于长期作过地方官，亲自目睹了北宋王朝的苛政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贬滴在惠州罗浮山的七年中，更以罪官的身份，亲身体会到了封建官场的腐朽黑暗和党派斗争的残酷性。同时也由于他远离了先前侧身其中的封建统治中心的朝廷，更容易看清楚朝政的弊端和腐败。因此，他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感，在自己的诗文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奢华和官场内部的腐败倾轧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他青少年时代的诗文，就已表现出了他的批判精神。如《明妃曲》“生男禁多材，长沙伴湘垒。生女禁太美，阴山嫁胡儿。……绛灌通侯延寿死，琵琶休怨汉天子。”这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蜜果》一诗，更是以待罪之身，“抵死输血诚”，直接对当时“岭南贡蜜果，海道趋彤庭”一事提出了批评，并以轩辕为民尝百毒的传说来对比批判当今皇帝劳民伤财以供奢侈的做法，这和那些借古讽今的同类题材比起来，其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勇气是更加令人惊叹的！

唐庚还在《张曲江铁像诗》、《张曲江画像赞并序》、《公无渡河》等诗文中，借屈原、贾谊、张九龄等忠臣贤良反遭斥逐的史实，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忠奸不分、贤愚不辨的腐朽昏庸。《郑默字序》一文，通过对历史上“韩非作说难，竟以说死”，“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闻而非之”到“近岁蔡常山以笑贬海上”的揭露，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对人们的“言笑歌哭，皆有所禁”的丑恶暴政。

封建统治阶级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欺诈是固有的现象。唐庚的一部分诗文就揭露批判了封建官场内的这种互相倾轧争斗的腐朽黑暗现象。他在《送赴安道下第》中指出，封建专制的官场中，是“大官危，小官卑”，“前日宰相今海涯，胡椒八百斛，流落知为谁？又不见州县官折腰事细儿，常忧一语不中治，敢对西山往社颐。”最后作者的结论是“君勿得官君勿悲”。他还在一些诗文中，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多方面地揭露和批判。如在《走笔赠仙姑》诗中，揭露在封建社会做官是在“是非海里翻波涛，五斗官米令人劳，安能俛首争锥刀。”在《泸人何邦直……》一诗中，通过对安溪把截将“有功不赏，反得罪贬来惠州，贫甚”的写照，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功过不分，是非颠倒的黑暗现象。在《张求》一诗中，通过对张求这一老兵“未死且强项，那暇顾炙手”气节的歌颂，批判了当时“士气久凋丧，舐痔甜不呕”的不良风气。他在获罪遭贬惠州后，更亲身体会到了封建社会场官的黑暗和险恶。他在诗中自诉道，“世味门常掩”（《醉眠》）“著书防恶客”（《杂咏》）“但觉转喉都是讳”。（《次勾景山见寄韵》）宋徽宗、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既打击保守派，又打击变法派，两次在朝堂立奸党碑。唐庚的《白鹭》一诗，就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倾轧和迫害的严酷：“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北宋王朝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开科取士又宽又烂，造成了比汉唐以来庞大得多的官僚队伍，致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唐庚在《谈邸报》

一诗中，也用委婉的笔调揭露讽刺说：“当今求多闻，取士到蓬荜，……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谏官，……台省诸公登袞袞，闭门熟睡黄绸稳。”

此外，唐庚还紧密系联当时朝廷政治外交形势，写了不少见解深刻的文章，评议朝政。他的《名治论》，批评了当时守旧复古派“其所称引，动以宗周为言，而问以当代治体，则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提出“古者一代之兴，则有一代之治”，“履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适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他在《存旧论》中，批判了当时旧党再度上台后北宋朝廷的礼仪制度反复迭变和日趋复古繁琐的情况，他既主张“古者帝王之兴，其正朝服色，自为一王之法”而“不慕前朝异姓陈迹”，又主张“国家旧物，宜使斯民常见而熟视之以习民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轻有改易以自绝于民也。”《辨同论》则批判了宋神宗熙宁元祐以来由于新旧党争而箝制言论，以言论之异同而为诛赏的专制主义，指出“刑赏生杀所以整齐天下”，而不能“塞异议之口”，并运用历史事实，说明“臣下同，人主孤，人主孤，则天下之祸不胜言哉！”提出了“贵和而贱同”的正确主张，即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要“贵和”，对来自人们的意见则要“贱同”。这一主张，对于压制、禁锢人们思想言论的专制主义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意义的。

(二)

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融成的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民族间长期进行着军事斗争。北宋王朝开国之初，承五代余绪，西北世为边患，北方大片领土长期被生产力和科学文化落后的辽夏等游牧民族占割，并不断南侵和烧杀掳掠，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当时的北宋王朝对这些游牧民族军军事斗争时战时和，但基本上实行的是一条因循苟且、妥协投降的路线。但无论是战与和，人民不是苦于兵灾，就是苦于每年输边的数十万岁贡负担。唐庚诗文对当时北宋王朝与各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是区别对待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甚至有时是矛盾的。请看《城上怨》这首诗：

雨似悬河风似箭，风号雨驰寒刮面。 何处巡城老健儿，城上讴吟自哀怨。
不知底事偏苦伤，声高声低哀思长。 戍边役重畏酷法，去国多年思故乡。
城上秋时夜方半，正是孤斋醉魂断。 和风和雨两三声，推枕投衾坐长叹。
传闻黠虏动熙河，战士连年不解戈。

这首诗大概作在变法派章惇执政时涪州守将章燾(1097—1098年)的筑城围逼西夏的平夏之捷后。在这首诗中，作者一方面对在风雨之夜中“戍边役重畏酷法，去国多年思故乡”围城的老兵表示了深切同情，一方面又理解到是由于传闻“黠虏动熙河”，才使“战士连年不解戈”的。同情感和抵御侵侮的要求在这首诗中矛盾地存在着，诗人无法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但是，唐庚并不是抽象笼统地鼓吹战争或反对战争，他是从当时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具体地区别对待的。由于当时西北方各奴隶军事制游牧民族所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们对北宋王朝的侵掠是野蛮对文明、落后对进步的破坏，严重地阻碍了当时汉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对于北宋王朝能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战争，唐庚是积极支持的。在北宋王朝时期，对西夏有两次大的作战胜利。一是王安石执政的熙宁五年(1072)所取得的熙河大捷。二是变法派章惇执政的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元年(1093)章燾筑城围夏的平夏之捷。对这些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军事斗争，唐庚是坚

决支持的，并写有《进贺筑表》二篇，其中提到对于西夏“当元丰之愿治，将议剪除，逮元祐之偷安，务从姑息，养成其恶以迄于今。”可见唐庚是赞同变法派抵抗外侮的军事斗争，而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偷安投降的军事路线的。在抗辽的军事斗争中，唐庚曾作了一篇大义凛然的《渝幽燕檄》，表现出了他抵抗外侮，收复失地的决心。

但是，唐庚对于对外战争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支持拥护的。宋徽宗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童贯腐朽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而乱开边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唐庚的《察言论》、《议赏论》两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他在《察言论》中指出，“古之人臣，抵掌缓颊，说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尝不引义慷慨，豪健俊伟……至考论其心，则有为国计者，有为身谋者”，接着举出历史上著名的事例说明“秦汉以来，说人主以用兵者多矣，……为国计者至少，为身谋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鉴哉，可不鉴哉！”他在《议赏论》中，别有创见地总结了“世知刖刑之弊而至于亡秦，而不知秦俗之败，正坐刖赏尔”的历史教训，指出“贪夫狗利，烈士狗名，不察其所狗为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岂其志哉？”批评了当时滥发赏赐，鼓倡兵端的现象。宣和元年，童贯为邀边功，先后结纳蔡京、王黼等，不顾国家帑藏空虚，廩食不继，边圉无应敌之具，军府无数日之粮的情况，视国家民族安危存亡如儿戏，联合强大的金朝以消灭势力已经衰弱并愿与宋朝和平相处的辽邦，自毁宋朝藩篱。唐庚从惠州赦还后，就又写了《资政韩公家传》一文，借以斥责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乱开边衅的错误举动。他因此闯下了杀身大祸，“几以身殉”。几年后北宋王朝的“靖康之难”也证明了唐庚见解的正确和深刻。总的来说，唐庚的文章论如析薪，切言中务，锋颖精密，时利义贞，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说服力。

(三)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正直贤良之士遭受压制摧残，谄谀庸碌之辈却位高权重的现象。为此，不少贤良文学之士发出过“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的感叹，这是封建剥削制度的一种本质现象，唐庚当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因此，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可以读到 he 发出的怀才不遇，壮志难伸，报国无门的喟叹！他在《击剑歌》中感叹“天下承平猛士闲，夜半无人自弹铗。”在《公无渡河》中，对屈原“抱石沉清流”，“忠血醉蛟蜃，义肉饱鼯鼯”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在《舞马行》中，借唐明皇教坊舞马流落人间，不为人识，最后因闻乐起舞而被杀害的悲惨事实来抒发自己贬谪岭南，报国无门的不幸遭遇。他在《张曲江铁像》诗及赞文中，借古讽今，指出“直道既彫丧，曲江遂疎斥。”并用“汲黯困后薪，贾生虚前席”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封建社会中正直贤良之士多不为用的历史现象。考虑到这些历史现象并结合到他自己“十分折腰敢长揖，欲吐壮怀还自吸”（《通判苏君俞见和复次韵答之》）的现实处境，他不禁“仰天太息输衔愤，被发惊呼不为狂”（《赠沪倅丘明善》）了。

唐庚“官不称其材”，长期宦途失意，“忧患摧折，曾不得吐气”（《上渝漕书》）。在被贬惠州后，他更亲身体会到了封建官场的腐朽黑暗和党派斗争的严酷性。因而他“功名事业有望于他年”的远大抱负和理想破灭了，除了思想情感上感到极大地不平和愤慨外，他也采取了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预行后事诛茅地，要近先生避世墙。”（城西别处厚居正两宗兄）“田园有妙理，吾悔得之迟。”（《独游》）老庄和

佛教的消极避世思想在他的诗文中也时有流露：“人生瞥忽如销膏，是非海里翻波涛。……愿仙乞我瓢里一丸药，武陵溪上抖擞世俗腥与臊”。（《走笔赠仙姑》）“便欲醉中藏潦倒，已将度外置纷纭。”（《谢人送酒》）“耕田佩印两徒然。”（《有所叹》）“斗智饶君三十里，著书还我五千言。……只将得一观天下，约法刘公已太繁。”（《跋道德经》）其它如《箕踞轩记》等散文也流露出一些消极避世的思想。

但是，唐庚毕竟是一个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是复杂矛盾的，并没有真正的消沉下去。他在《益桥铭》中曾明白说过：“君子之心，何尝不欲兼济而有所谓独善者，彼非得已也，顾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时，而适有毫发便利可以益人，则虽穷厄九死之余，苟可以致力彼未有弃而不为者，……。”应该说，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是可贵的。他的消极避世态度，是由他所处的险恶政治环境造成的。他以罪官的身份，在惠州过着“世味门常掩，时光镜已便”（《醉眠》）的生活，自己要写一点诗文也是“著书防恶客”（《杂讴》）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掩藏起来：“只愁鳶跼跼，敢作鹤昂昂。”（《杂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洁身自好，保持节操，不随波逐流。他在《陈子美竹轩记》中，就借歌颂竹之扶疏抗直，龙腾剑拔，非有妖丽妩媚可以移人之意，来表现自己与陈氏“趋向高远”，“性与竹会”之凛然气节。他在《病鹤行》一诗中，就以病鹤自喻：“波痕侵月白皑皑，千声万声鸣哀哀。不飞不翔不饮啄，骨脊棱棱瘦如削。冰姿玉质仅生存，雪羽霜毛半零落。鹤兮鹤兮何郁郁，我知尔是冲天物。芝田养就孤高情，瑶池洗出神仙骨，……。”他为自己勾勒了一个虽遭迫害，但仍孤高不凡，持节自守的艺术形象。

（四）

上面我们概略地介绍了唐庚诗文的思想内容的特点，下面我们再来分别谈谈他诗文的艺术特点。

唐庚诗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诗意清奇，追求一种清新朴实的自然美。他自己就曾说过，“空令半夜忍饥吟，搜到池塘春草绿。”（《苏时中惠荣》）“自得清新庾”。（《书郑抚千诗后》）“搜句工虽淡”。（《题所居》）同时，他还注意向民歌学习，“好传江上女，歌向竹枝秋。”（《书郑抚千诗后》）因此，他的诗不沿袭古人，清新自然，多佳句警语。如“时光新旧岁，节物浅深知。”（《独游》）“烟岚向冬净，橘柚得霜黄。”（《壬辰九月二十三日始寒，以诗记之》）“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草青仍过雨，山紫更斜阳。”（《栖霞暮归，书所见》）“残梅诗兴晚，细草梦魂春。”（《人日》）“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野望》）唐庚在惠州时，还写下了许多描绘岭南风物人情的诗篇，如《杂咏》二十首，《骤雨》、《江涨》、《立冬后作》、《独游》、《野望》、《春日杂兴》七首，《六言即事》二首，《西溪》等诗，这些诗不但清新自然，而且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惠州一带的自然和社会风貌。

（二）刻意锻炼，简洁紧凑而不失其气格。唐庚创作态度严谨，他不满意粗制滥作，动辄千百言的“今之君子”。他自述作诗甚苦，反复改正，必深求其疵而去之，殆近法家，难以言恕，正如他诗句所说，“诗律伤严近寡恩”。（《遣兴》）

（三）工于属对，常用迭音字、联绵字和双声迭韵字入对，因而富有较强的形式美和韵

（下转第102页）

是不能够同样地施用于一切人们的”。他强调“要让每个人都顺着他的天性的倾向去发展”，“知识若不合于这个或那个学生的心理，它就是不适合的”。夸美纽斯重视儿童的个性差异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他对儿童才能存在着的差异未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甚至还有错误。例如，他根据接受知识的快慢（伶俐或迟钝），接受长者教导的态度（柔和顺从或坚牢不屈），求知欲的高下（渴于求学或懒惰），把儿童区分成六种不同类型的性格，这显然不科学，带有随意性。特别是他认为第六类型的儿童智力低、

性格倔强、邪恶，“这种人很少有什么用处”，则是错误的。

总的说来，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作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种教育思想，它与近代法学、近代医学理论中要求适应自然的原则一样，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既有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夸美纽斯之后，许多民主主义教育家，如卢梭、裴斯塔洛齐、第斯多慧等，他们都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论证和发展了自然适应性原则，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是与近代教育学鼻祖夸美纽斯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

（上接第136页）

律美。例如：“蟹黄噉止酒，鸡白劝加餐。”（《杂咏》）“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长沙道中》）“声入家家树，凉传处处窗。乱流鸣泐泐，垒鼓闹庞庞。”（《骤雨》）“徘徊未忍指鸡肋，寂寞犹能顾雀罗。”（《赠博士承无议无尽》）。

（四）巧于用事。宋诗特别是江西诗派统治的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的诗坛上，以事入诗，典故连篇，形象枯竭是比较突出的现象。唐庚诗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影响。诗中常用典故，如“那能天补綻，更欲海填深。”（《自笑》）“一杯相马酒，千古竹林人。山入永嘉路，蚁浮彭泽巾。”（《率诸公饮开元寺勉翁有诗因次其韵》）“朝持汉使节，暮作楚囚奔。路入离骚国，江通欵乃村。”（《武陵道中》）等。但用事甚巧，不为事使，基本上做到了“有而若无，实而若虚。”（《明王世懋语》）可谓善使事者。

唐庚文章的艺术特点，我们在前面分析其思想内容时也可看到，具有紧密联系社会现实，明白晓畅，平易朴实，长于议论，见解深刻的特点。除前面谈到过的一些文章外，他的《悯俗论》《正友论》、《射象记》、《易庵记》、《大鉴碑阴记》、《新修敕书楼记》及《三国杂事》等均表现出作者勇于独立探讨，不囿成见，敢发前人所未发的精神。他的《三国杂事》两卷，被明代徐渤称为“评史斧钺”。由于唐庚文章能密切联系实际，因此立论通达而不拘泥，切言中务，时利义贞，逻辑性强，多为可采。所以《宋史》称他“善于属文”，“为文精密，通于世务，时人称之。”可见唐庚当时就以文章知名于世。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